

企业、市场和政府

——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
若干经济学思考

胡雄飞 著

QIYE SHICHANG HE ZHENGFU

DUI JIANLI XIANDAI QIYE ZHIDU
DE
RUOGAN JINGJIXUE SIKAO

上海教育出版社

企业、市场和政府

——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 若干经济学思考

胡雄飞 著

QIYE SHICHANG HE ZHENGFU
DUI JIANLI XIANDAI QIYE ZHIDU
DE
RUOGAN JINGJIXUE SIKAO



上海教育出版社



98865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企业、市场和政府：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若干经济学思考/胡雄飞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1

ISBN 7-5320-7172-3

I. 企... II. 胡... III. 企业管理制度-研究-中国
IV. F27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8933 号

企业、市场和政府

——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若干经济学思考

胡 雄 飞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昆山亭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5 插页 4 字数 292,000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50 本

ISBN 7-5320-7172-3/G·7328 定价:(软精)20.00 元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日趋抽象，它似乎无需现实经济体系作支撑。但如果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东西真的只存在于经济学家的心目中，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那确实只能如罗纳德·哈里·科斯教授所言，是一种“黑板经济学”。我在本书中所做的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经济学思考，就是努力要使“经济学”与现实的经济实践相一致，成为本来就应该有的那种经济学。

——题记

F/kas/-3

前 言

本书是一部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又以上海试点实践为重点进行考察，论述国企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若干经济学理论问题思考的专著。成稿于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之前，出版于四中全会之后。

前几年随着试点工作高潮的过去，人们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热情曾渐渐淡去，甚至连经济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和许多专司此项工作的同仁也不例外。一些地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的机构也撤消了。人们心存疑虑，改革发展到今天，再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有什么必要吗？

笔者始终认为，经济体制脱胎换骨的改革剧痛已使我们的思维日趋理性。大规模试点工作的结束，正是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小结实践利弊得失的最佳时机。我们若能冷静地在以往实践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完成“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这一“认识之能动的飞跃”，那就可以给国企改革攻坚战的胜利和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笔者坚信，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一些深层次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思考，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的价值，更重要还在于它具有实践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再一次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当人们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重又重视起来的时候，笔者在感到无限欣慰的同时，更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所驱动：为“能从抽象的思维再到

实践”，使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能“比较地进入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作为一名亲身参加这一实践活动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对国企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若干经济学理论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为使研究成果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现实与历史相一致，笔者在从事本书写作的过程中重点抓住了以下四个环节，并尽可能把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以整体的形式为读者提供一个有一定价值的参照体系。

一、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角度来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确有许多重大问题值得探讨，特别在涉及经济体制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方面。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不论从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是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讲，都需要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实践作一客观的历史分析。因此，本书结合对企业制度、市场制度、经济体制历史演化进程的考察，以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作了一些必要的探索。

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郑重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

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

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但是,按传统经济学的说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现代企业”的概念,也有“企业制度”的概念,唯独没有“现代企业制度”的概念。我国为什么要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呢?它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是什么关系?两者是否存在矛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否像学术界、理论界部分学者和专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画蛇添足之举呢?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以某种结构的经济体制来实现这一目标。经济体制结构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机制,进而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性质,表现出不同的效率。而这一切又都只有通过经济体制中的各种组织才能加以实现。“层级组织和市场组织是经济体制的两大基本组织形态。在古典市场经济体制中,层级组织通常仅指企业组织;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层级组织不仅包括企业组织,还有政府组织以及两者向市场组织逐步递进的某种过渡形态或转换形态的中间性体制组织。”^[1]各种组织在对资源配置的功能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这种相互替代不仅会影响企业、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运作效率,还会影响到经济体制整体运行的效率。

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是经过几百年的磨合才逐步发育、发展并成熟起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哈里·科斯教授(Ronald Harry Coase),早在1937年就以《企业的性质》一文揭示了被理论界称之为“企业黑箱”的秘密,并科学地证明了企业与市场在对资源配置的职能方面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企业的显著标志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企业与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2]以后,以科斯教授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家们,对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几百年来企业组织与市场组织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互动演变的过程,进而对

市场经济体制制度的演变作过极为精辟的论述。[3]从他们的理论研究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市场实现替代的轨迹。

但是,科斯的经济理论中完全没有政府的地位。不要说在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来抑制经济危机等大的方面,就是在解决诸如大气污染等外部性“市场失灵”等问题时,科斯教授也仍主张用企业间“自愿联合”或称“协商解决”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显然都是不切实际的。“市场失灵”的问题仅靠企业间“私下解决”,高昂的交易费用将会导致低效率乃至无效率。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虽然没有使用“替代”这一概念,但是他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掀起的“凯恩斯革命”和以该理论为指导的“罗斯福新政”,使国家或政府主动介入了市场,拓展了市场的广度、深度和“有效需求”,因而在经济发展史上有了政府对市场的替代。

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教授是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他把科斯经济理论上的缺陷称之为“科斯谬见”,[4]这是极有见地的。只是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又把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的作用和地位过于绝对化了,以至于把政府与代表私人利益的企业(私人部门)、政府的调控与市场的运行完全割裂开来,成了互不相容的对立面。这正如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迪特·鲍斯教授所言,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观点未免“太偏激了”,斯蒂格利茨教授的理论描述与客观经济发展的进程“并非如此一致”,事实上也并不存在“如此有强制力的国家”,[5]因为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在对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中,如同市场在运行中会出现“市场失灵”一样,政府也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弊端,这些弱点和弊端会导致“政府失灵”(或称“公共失灵”)。

其实,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有矛盾的一面,更有相互联系的一面。问题是三者之间究竟该形成一种怎样的关系。各自在对

资源配置的职能方面,究竟该作怎样的界定?特别是政府究竟在市场体制的运行中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一个比“现代企业制度”概念要大得多、内涵要深刻得多,且具有更高层次经济学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围绕“国家干预市场关系”命题展开的争论,若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时期中最初出现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说算起,至今大约已有 500 年的历史了。对这个十分古老但又永新的重大现实问题,本世纪 30 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国际经济学理论界的争论更趋激烈。科斯、凯恩斯、斯蒂格利茨和鲍斯的争论,只是国际经济学理论界激烈争论的缩影而已。同时,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政府在各自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也都作了极为有益的探索。

如果说科斯的经济理论说明了企业为降低交易费用增加效益而逐步替代市场的过程,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诠释了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对部分市场职能的替代,那么,五六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遇到经济“滞胀”以来的历史证明,只有当企业、市场和政府三者之间找到一个比较适当的“度”,才能使经济体制的结构处于一种均衡状态,国民经济才会稳定发展,整个经济体制才能高效运作。

可以这样说,西方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成熟的过程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个企业替代市场、政府替代市场的过程;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过程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受经济生活实践的制约,他们对理论的研究也仅局限在企业对市场、政府对市场等相互关系方面。

从逻辑上讲,由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概括出来的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市场和政府要形成合理的结构,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当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而且,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体制的效率,也是我国改革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但中国有自己的国情,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国家所有为主要特征的公有制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中国经济特有的性质。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政府组织是经济体制中唯一的要素,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从事工贸生产经营的单位,都只是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已。因此,中国为提高经济体制运作效率而进行的改革,走的必定是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途径:市场机制逐步替代政府组织的部分经济职能;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逐步替代了政府组织的附属物地位;企业在向现代企业转化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在把市场交易内部化的同时,进一步在中观层次上实现了对部分政府组织的直接替代。

从单一的政府组织,通过替代,使企业、政府和市场形成合理的结构,逐步接近最佳的结合点,使整个经济制度结构在替代中实现动态的均衡,这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家们从未遇到过的课题,因而也是经济学还未曾开拓过的崭新领域。因此,一度曾经给我国经济理论界以“刺激和灵感”的西方经济学,虽然赋予我们不少有益的启迪,却在我国生动丰富、日新月异的改革实践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既不能直接运用于中国经济,又无法解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制度结构变迁的过程,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有义务,也有责任对经济史上这一重大的变迁作出科学的解释。

为能加快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加快市场、企业对政府部分经济职能的替代,尤其是加快市场竞争主体的形成,我们迫切需要建立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加快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并通过转换机制而真正转变成为现代企业,从而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这就是现代企业制度。

从纯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实质同样是一种替代的过程。准确地讲,这种替代过程是动态边际替代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企业制度与市场制度结构变迁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它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中的经济、历史与

现实、理论与实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是市场经济基本理论得以在中国应用的一个落脚点、支撑点。不言而喻，像中国企业这样大规模替代政府部分经济职能的变革，在世界企业发展史，乃至经济学说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创新之举。因此，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实践意义，还将对今后的改革进程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它具有鲜明的转轨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

中国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正在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完成着企业与市场对政府的部分经济职能的替代，其中当然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赋予了“政府干预经济”这一古老命题以全新的内涵。开垦这些经济学理论的处女地，拓展这些经济学理论的新空间，当是我国经济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继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并对此作经济学的分析与反思，是这种努力开拓、有益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实践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和研究，可以作出富有理论价值的实证分析。

现代企业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以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为基础，以有限责任制度为保证，以公司企业为主要形态；以产权明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体制。作为一种体制模式，这种新型的企业制度有可能使我国的企业真正成为面向国内外市场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

但是，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一种微观经济体制，既不可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孕育形成，也不可能离开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体制的发展而自发孤立地形成。现代企业只有在企业、市场和政府三维结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整体同步发展的条件下，才可能形

成并日趋成熟的。显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环节,两者不仅不相矛盾,而且连动发展能够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尽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开始的时候,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行了十六七年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取向也提出多年了,但我们仍然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其起点不应是只有企业与市场两要素构成的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一种政府也已成为经济体制的内在变量,并且政府、企业 and 市场三要素之间职能明确,界定合理,从而体制结构也较为均衡稳定的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然而,当时我们面对的现实状况是:(1)由于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是唯一的体制要素,是资源配置唯一的主体,所谓的企业只是政府的组成部分,或者说只是政府组织的附属物,政府不转变职能,市场是很难发育成长起来的,企业更是难以摆脱政府的行政指令而发展成为独立的现代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2)由于缺乏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认识,改革初期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许多地方、许多方面实际的切入点是自由竞争时期的古典市场经济体制。一些企业试图完全摆脱国家对其进行的管理,包括正确的宏观调控。而政府的一些经济部门,一方面在应该转变职能的地方未能转变,继续过多的进行行政干预,政企不分;另一方面在政府应该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宏观管理的领域,比如生产力的合理布局、防止重复建设,尽快建立比较完善的市场法规体系等方面,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又远未能到位,甚至完全放弃管理。结果,在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以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各种弊端的同时,我们不得不还要化更大的精力来克服以政府仅充当“守夜人”、企业相互间“自由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古典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各种弊端。从某种角度讲,后者比前者更难

克服,因为,后者的头上往往闪耀着所谓“改革成果”的光环。尽管我们常常在被迫咀嚼由此而产生的苦果且难以下咽,但由于对这一基本问题还缺乏起码的认识,人们对由此而引起的种种经济问题明显缺乏足够的重视,有些人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更不用说认清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了。

因此,为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们必须先初步构架起能使现代企业规范形成、健康运行的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为现代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的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我们要把政府的一部分经济职能交还给企业,甚至政府的部分机构要转制为企业;我们要培育和发展各种市场,健全市场运行的法规体系。现代企业与现代市场是互为连动的,只有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框架的同时,大批的现代企业才能应运而生、脱颖而出。这正是笔者为什么要以《企业、市场和政府》为题,对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些经济学思考的原因所在。

科学的理论对于改革来说,具有明显的导向性、超前性,然而,由于改革的实践日新月异,新的情况和新的经验层出不穷,理论需要一个经验积累和总结的过程才能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理论因此又有很强的滞后性。试点工作结束后,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阶段的经济实践加以总结,进行实证分析,因为与理论相比,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且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部专著系统地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笔者是有意以本书为天下先的。

作为本书研究的重点对象,从1995年起,上海开始了率先在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上海初步形成了企业优胜劣汰、职工能进能出、社会保障覆盖全社会、经营者竞争上岗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五大机制”,并且,正在努力加强企业的产品开发、加强技术改造、加强市场的开拓、加强企业内部的管理、加强企业员工队伍的建设,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上

海的试点实践创造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处在当前承上启下、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关节点上,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框架作一些客观的经济学实证分析,并在反思的过程中得出一些深层次的具有经济学意义的理论观点,可以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提供前车之鉴。

不过,有一点是需要特别指出的,那就是现代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过程,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更是一个过程,不仅不可能一蹴而就,还会明显呈现出不成熟性、过渡性和阶段性的特点来。国有企业的转制往往不能一步到位,一些企业制度、市场制度中最基本的问题也常常难以做到。比如,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凭借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否定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对企业内部的经营决策进行干预,这种产权关系形成的行政锁链,是政企不分的重要原因。对这类似乎是常识性但却事关现代企业制度基础建设的重大问题,本书无论在基本理论的论述方面,还是结合实际的实务操作方面,可谓是不怕重复,不厌其繁的。

三、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个中心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难点和热点问题,同样需要我们做一些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个角度出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难点和热点问题。其中有许多重大的经济问题值得我们作深层次的经济理论思考。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究竟是自由竞争的古典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由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究竟该如何进行?西方经济学界所谓的“私有化”的概念其内涵究竟是什么?目前通行的表述准确吗?私有化可以解决经济体制的动力机制问题,但它一定能解决经济体制运行中的监督约束机制问题吗?怎样运用市场机制对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怎样结合国有企业的公司

制改制对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大量冗员剥离、产业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实施战略重组等造成许多员工下岗,下岗就是失业吗?怎样正确地认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以及失业率?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危机可以给我们以怎样的启示?为了预防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泡沫经济的产生,我们该如何安排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制造业和金融业(尤以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为甚)的关系?为能真正优化配置资本,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规范证券市场?为能抑制股市中的投机性,运用证券市场的机制促使上市股份公司真正转变机制,促使股民为绩优企业长期投资,对上市公司能否进行优胜劣汰,允许对其实施兼并破产,而不仅仅限于“借壳”、“买壳”?中国到了后工业社会的时期了吗?上海到了后工业社会的时期了吗?随着经济发达国家知识经济的兴起,中国的知识经济该怎样发展?知识经济的载体是什么?韩国的部分大企业集团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倒闭破产,沉重打击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走培育和发展大企业集团之路是否会重蹈韩国的覆辙?为了理顺产权关系,国务院和许多地方政府对部分经济管理部门、大型集团公司进行了国资授权,这种措施的积极作用是什么?又有哪些弊端?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提法有没有道理?国有企业经过改制能否形成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它对现代企业的形成,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具有怎样的意义?……

结合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生动、丰富的实践总结,笔者力图从理论研究和探索的角度出发,在各个相关的章节中对上述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和发生的热点难点问题一述己见,并由衷地希望,本书的“一家之言”能抛砖引玉,起到与各位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和海内外的专家,共究经济发展“天下之际”的作用。

四、尽可能系统地保存一些有研究价值的国企改革、现代企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史料,以供经济学理论研究之用。

试点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生动且极有理论研究价值的经济学史

料。筛选、汇集、保存这类资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此,结合各章的论述,本书有意识的通过有选择地应用这些资料,以有序的、系统的保存一些有研究价值的关于国企改革、现代企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史料,既佐证本书的论点,亦可作为一种参考资料供读者研究使用。但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为了保持这些材料的历史真实性,在文字方面笔者尽可能按原材料的表述方式记述;二是在时间上,各种材料大体都截止在 1998 年底以前。对这一时点以后延续发生的过程,本书在出版时没有再做新的补充或调整。

本书共设七章。第一章至第三章以经济发展史为线索,通过对企业制度的变迁、市场制度发展的分别考察,综合论述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发展、成熟及其特征,进而从理论上提出,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质是一种适应现代成熟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微观经济体制的论点。第四章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出发着重阐述了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框架确立的问题。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政府一要素结构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市场和政府的三要素结构发展,因此,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框架的确立明显具有阶段性和过渡性的特征,这是由现阶段中国生产力水平和转轨时期经济体制的制约所决定的。第五、六、七章结合实际具体研究分析了我国的企业、市场和政府各自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它们各自要作怎样的调整。文中还明确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框架的确立体现在企业、市场和政府各自身上的、可以得到实证的诸多标准。其中,尤以政府为重点,因为从一要素结构向三要素结构转变的事实本身就说明,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处于极为特殊的地位,它既是改革积极的推进者,又是改革的主要对象。结束语部分,提出了本书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展情况的基本判断,即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框架已大体确立,三维结构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初步确立,现代企业只有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

加快确立自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独立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竞争的主体。

本书按原计划早在 1998 年初就要出版的,因为上海三年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到 1997 年底告一段落,在初步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即在初步形成了宏观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从 1998 年起已把重点转入到企业内部的运作方面,转入到企业如何按现代企业的要求高效规范运作的方面去了;而在全中国,党的十五大再一次明确地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并且要求“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要坚定信心,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选择这一时点论述“企业、市场和政府”这一命题,本书的“时效性”无疑能得到充分发挥。笔者也能以一己之见为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出谋划策,尽微薄之力。

然而,计划未能如期实现。笔者曾为之寝食不安。原因主要有:一是当时身处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企业管理处,同时兼任上海市现代办办公室负责人,国有企业改革的事务性工作异常繁忙;二是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又曾与我的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首席教授伍柏麟先生合作完成了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主编的、市社科“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学习党的十五大精神丛书》之一的《培育和发展大企业集团》一书;三是从 1998 年开始的日趋严重的亚洲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迫使笔者不得不对本书阐述的一系列观点,特别是“成熟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事关全书的核心概念,进一步作些更深入的经济学的理性思考。现在,此书虽然推迟了两年出版,但笔者却因此而有可能对一些观点作补充